

從「共舞」到「舞台展演」：
記者、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的三方關係

張文強*

摘要

本研究發現，在允許情境差異下，當下許多新聞產製工作需要從記者、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三方關係進行理解，相較於共舞，「舞台展演」是更適合的比喻。舞台上，公關人員扮演中介角色，一方面讓消息來源平日得以選擇隱身，或在公關安排下出現。另一方面則透過提供記者所需的各項服務，設法讓記者願意在舞台上配合演出。在實務場域，「舞台展演」有助三方行動者各取所需，完成新聞產製工作，但「舞台展演」也對傳統記者角色產生負面影響，並對應一種「設計好的透明度」，深層顛覆新聞在社會中的意義。

關鍵詞：新聞產製、新聞工作、記者、消息來源、新聞專業

*張文強為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教授。聯絡方式：049214@mail.fju.edu.tw

壹、前言

「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是新聞產製關鍵」，是一項很少被質疑的命題。基於這項命題，新聞學者長期關注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並累積了豐富研究，另外，這項命題所標示的「記者」與「消息來源」對偶關係，更是對應新聞學術場域長期以來理解新聞產製的框架。「跳探戈」或「共舞」這個由 Gans (1979) 提出的經典比喻，描述的便是一種兩人關係。不過近年來公關人員的建制化，配合新聞工作液態化，默默顛覆著這組對偶關係，以及以此為基礎的記者與消息來源研究傳統。兩項改變凸顯了公關在新聞產製過程的中介角色，然後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經常卡著公關人員的現實狀況，提醒學術場域需要適度跳脫對偶關係框架，設法因應這種新的三方關係來理解當下新聞產製相關問題。

一、本研究主軸：以三方關係做為一種理解新聞產製的框架

(一) 傳統脈絡：記者與消息來源在路線上的共舞

早在 1970 年代，Sigal (1973)、Tuchman (1978)、Fishman (1980) 與 Gans (1979) 用各自方式探討新聞產製過程的同時，便以不同篇幅描述了記者與消息來源相關議題。其中，Gans (1979) 提出的「共舞」更是理解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的關鍵比喻。

就實務論實務，與消息來源互動是記者份內工作，雙方互動也的確是理解新聞產製的關鍵，只不過準確來說，基於以往期待記者跑出獨家新聞、進行深度報導的標準，「互動」不僅是指雙方有見過面，因為採訪某起新聞事件而進行的一回合式接觸，更是指一種互動關係的建立。然而良好互動關係的建立並不容易。首先，記者需要「路線」幫忙縮小與專門化守備範圍，讓其所需接觸的消息來源具有可預測性，而且數量合理，才不致因為消息來源來自四面八方，彼此只有點頭之交，或訪問完便不再聯絡，進入一回合式互動的循環。其次，雙方的各有所圖讓互動關係建立變得更為複雜困難。記者需要消息來源取得新聞，卻不希望因此被操控，相反地，消息來源沒有義務提供消息，或者有些消息來源期待與記者互動，設法讓

好消息被報導，卻極力避免壞新聞曝光。這些狀況促成記者需要豐富實務能力與策略，透過多次互動培養信任與默契，才可能與某位消息來源建立長期的良好互動關係。也就是說，一回合式互動有其價值，不少新聞便仰賴這種方式取得，但為了穩定取得新聞線索，為了獨家新聞、深度報導，理論上，記者需要克服困境，與某些消息來源建立起關係，在競合、共生脈絡中與他們共舞。

也因此，配合權力競合、交換、共生、愛恨關係這些概念來看（Blumler & Gurevitch, 1981; Giber & Johnson, 1961; Hess, 1981; Larsson, 2002），共舞不是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一回合式互動，而是一種長期的互動關係。共舞這個比喻之所以精彩，也不僅在於它指出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對偶關係，更是因為它掌握了雙方互動時的複雜動態過程，以及雙方為了共舞，在背後親自互動、長期經營所投入的心力。老一輩記者大都能體會這種共舞精神，了解記者需要長期經營，消息來源才會在關鍵時刻接起電話。相對地，消息來源亦是如此，會親自試探哪些記者可以變成朋友，需要時透過他們放消息，放心給予獨家新聞。透過多次磨合與相互試探，既競爭又合作的雙方才可能好好共舞，讓記者產製出好新聞。當然，儘管共舞生動掌握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本質，但這個經典比喻更適合被視為一種理想型概念，我們不能誤認以往記者與消息來源都處在共舞狀態，事實上，對實務工作來說，擺脫獨家新聞、深度報導的束縛之後，一回合式互動或許對雙方更為方便。

（二）當下脈絡：舞台上的記者、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

就在共舞仍持續引導學術想像的同時，台灣社會與媒體環境變化快速，以及實際發生缺乏獨家新聞、深度報導等各種媒體現象，促成我們需要嚴肅思考一組問題：當下，記者與消息來源還在共舞嗎？或者更根本地，以往利用記者與消息來源這組對偶關係來理解新聞產製的作法是否依然適當？關於這組問題，涉及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角色的定義方式，以及從對偶關係（記者與消息來源）到三方關係（記者、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的轉折。

整體來說，以往研究關切記者與消息來源如何互動，但消息來源卻有

著缺乏統一定義的問題（臧國仁，1999），綜合以往研究（Gans, 1979; Shoemaker & Reese, 1991; Strentz, 1989; Voakes, et al., 1996），消息來源可以是指記者實際採訪或新聞中提及的個人、組織、公共資料等，而所謂的公關人員包含在「個人」之內。不過儘管如此，我們不難指出，期待得到真正的新聞線索，又不想被操控，是記者與消息來源共舞、周旋，以及學術研究關切此議題的原因。因此，配合實務工作來看，以往研究在意的是部長、科長、司機、深喉嚨這些可能提供真正新聞線索，而非公關稿式消息的消息來源，在民主、第四權脈絡下，又更為指向官方身分的消息來源。這種狀況延續至今，例如 Brants 等人（2010）關切媒體原先抱持的健康式懷疑主義如何變質變酸，讓記者與政治人物開始不信任彼此。Van Aelst 與 Vliegthart（2014）以荷蘭國會議員質詢與媒體報導為對象，描述兩者間的複雜共舞關係。回應社群媒體潮流，學者則開始研究社群媒體對記者與政治人物關係產生的影響（Broersma & Graham, 2012; Ekman & Wildholm, 2015; Vobič, Maksuti, & Deželan, 2017）。

相對於這些「真正」的消息來源，就同樣可以提供消息、或以提供通稿式消息為專職的公關人員來說，過去相關研究大致採用兩種應對方式，一是如上段所述，將他們模糊含括於廣義的消息來源之中，但研究焦點仍在記者與政治人物等真正消息來源的共舞之上。畢竟，既然公關人員是基於職責提供通稿式消息，而非獨家新聞，記者似乎也就沒有與他們大費周章共舞的必要。二是將公關視為獨立研究對象，但因站位新聞專業，所以往往呈現一種擔憂基調，擔憂公關包裝政治、操控新聞資訊流動，妨礙記者直接取得一手與關鍵資訊、影響民主與第四權運作（Davis, 2000, 2003; Franklin, 1994; Herman & Chomsky, 1988; Turk, 1986）。

然而時代改變，上述研究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的方式需要做出調整。跟隨英美公關產業大幅成長，廣為政府與企業運用的腳步（Davis, 2000; Franklin, 1994），在臺灣，近年來藉由雇用政治公關公司或聘用記者做為公關幕僚等公關建制化作為，加上當下媒體不給記者經營消息來源時間等液態特徵，這兩股將在下節深入論述的趨勢共同改變了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嚴肅指向共舞瓦解的可能性。姑且先不論記者是否敵視公關人

員這個問題（DeLorme & Fedler, 2003; Niskala & Hurme, 2014; Ryan & Martinson, 1988; Verčič & Colič, 2016），就現今新聞產製而言，公關人員重要性被明確提升，在新聞產製過程中扮演起細緻角色，他們從「消息來源」原先的模糊定義中跳脫出來，成為一種常態性的存在。更精準地說，公關人員進入原先應該只有記者與消息來源的舞池，積極中介起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從旁指導消息來源該如何跳舞，或乾脆代替消息來源與記者跳舞。然後因為記者也逐漸習慣這種模式，原先的對偶關係逐漸轉變成三方關係。

在這種狀況下，本研究主張，對應過去新聞產製情境，以往研究緊盯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的確具有合法性，但前述改變徵兆卻也在提醒我們需要重新回到新聞產製源頭，看到公關人員的角色位置，並且跨越以往研究習慣的對偶關係框架，細緻勾勒當下記者、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三方如何合作產製新聞？嘗試理解這種產製方式會對新聞工作造成什麼影響。而這也是本研究在充滿新研究議題的學術情境中，選擇關切這個古典、顯得老派研究問題的原因。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做為作者長期研究新聞產製的一部分，係最近執行的一項研究。就整體研究脈絡而言，作者是在過去訪談新聞工作者過程中，觀察到「共舞概念可能需要修正」這項最初的研究主張，隨後藉由回溯資深記者與年輕記者在以往研究訪談中的描述，例如如何經營路線、如何與消息來源互動，並且配合閱讀相關文獻，進一步具體主張新聞學術場域應該重視公關人員成為常態性存在的事實，嘗試從三方關係來理解當下新聞產製樣貌。為了探索與建構這種公關中介下的新關係，此次研究並未採用傳統假設驗證式資料蒐集策略，而是透過文獻閱讀、經驗證據蒐集分析、問題再反思的反覆循環辯證，期待在各個環節交互比對下，建構出最後理論論述。

基於以上研究提問脈絡，為明確回應公關人員在新關係中佔據關鍵位置、以往文獻甚少從公關角度論述新聞產製，以及研究者透過之前執行研究已大致掌握記者端看法這幾項原因，本次研究以深度訪談公關人員做為

主要經驗資料來源，藉以有效率地勾勒公關中介下，記者、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三者的關係。而為了掌握不同公關介入情境，同時考量公部門採訪路線較為明確、固定，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較為頻繁，更為接近以往「共舞」經驗，再加上新聞研究長期關切公部門的第四權傳統，並以官方消息來源為主的傳統，本研究共深度訪談 12 位政府單位負責媒體相關事務人士（1 位訪談時已離職），以主要經歷區分，3 位屬政治人物機要性質、5 位部會局處、2 位警政、2 位公營事業。此外，本研究還訪談 4 位民間企業（機構）負責媒體事務實務人士，以及 1 位公關公司高階主管，企圖藉此對比公部門經驗，捕捉更多樣、細緻與完整的圖像。

總計訪談人數為 17 人，訪談期間為 2017 年 7 月到 10 月，研究者以一對一方式親自訪談，每次時間大約兩到三小時。執行訪談前，研究者事先挑選受訪者服務單位實際見報之新聞個案，並參考受訪者工作經歷與服務單位屬性設計訪談大綱，訪談執行過程中則視需要做出追問，並彈性調整細部問題。主要問題方向包含請受訪者以研究者事先挑選的新聞個案，或盡量自行舉實例說明與記者互動相關細節、既有公關機制與處理流程、實際工作（如負面新聞處理、記者會、新聞議題操作、社群媒體經營等）執行過程與相關考量、媒體與記者關係經營方式、與單位長官互動情形、對當下新聞與新聞工作看法、對記者與公關角色的認知等。

而跟隨深度訪談個案逐漸累積，並且配合以往研究掌握的記者端資料，我們更有自信於原先提問。然後對應接下來即將論述的各種現象，本研究以「消息來源主導的舞台」做為主軸，替代傳統「記者與消息來源共舞的舞池」，簡單來說，用「舞台展演」替代「共舞」，勾勒記者、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的三方關係型態，並完成此篇研究論述。但需要說明兩點，首先，本文利用「舞台展演」做為描述當下新聞產製模式的主軸，並不代表個別共舞的消失。現今還是可能存在特定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共舞；仍有認真記者會花力氣經營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有些路線，例如警政記者與警察間還是有較多互動機會；相較電視，報社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關係還是比較密切。也就是說，基於研究發現，本文提出「舞台展演」，但並不排除就特定記者，或特定議題或事件而言，還是會出現記者跳過公關人員，與

消息來源發生較深互動的情況。其次，本研究主張從行動者與結構相互作用的立場理解這種新關係。也因此相同環境中，某些認真公關人員將消息來源的舞台經營得非常好，並且提出自己在「經營記者」這種帶有戲謔成分的說法；有些公關人員則不太認真，讓舞台僅具基本功能。或者某些認真記者在消息來源的舞台上，還是可以積極扮演傳統記者角色，不致完全成為劇本安排下的角色。

貳、從共舞的舞池到消息來源的舞台

新聞工作液態化與公關建制化兩股重要力量，具體瓦解了以往支撐共舞的主客觀條件。然後配合著記者與消息來源意志的此消彼漲，本研究主張消息來源主導的「舞台展演」，更適合描述公關中介下的新聞產製樣貌。

一、新聞工作液態化與共舞的瓦解

如前所述，路線創造記者與消息來源共舞的基本可能性，然而想要順暢共舞還涉及一組成對條件：媒體允許甚或鼓勵共舞，以及記者本身要有意願。

過去，台灣新聞工作存在類似條件，報社給予記者時間經營路線、期待記者跑出真正的獨家新聞與深度報導，配合上相對優渥的薪水福利，記者也願意長期投入新聞工作，種種主客觀條件創造出一群黏著於自己路線的記者，親身、長期經營路線上的消息來源（張文強，2015）。路線因此如同一個個舞池，記者可於其中常態性尋找、開發與接觸適合的舞伴，並且透過實際共舞培養默契。當然，消息來源也在舞池內選擇共舞的記者，達成取得曝光機會、放風向球等目的。共舞，是雙方的事；舞池，是雙方的場子，記者與消息來源都在爭取帶舞機會。

然而對應 Bauman (2000) 描述的液態社會，高度資本化、高度消費社會特徵、新科技發展，同樣創造了一種液態化新聞產製模式 (Jaakkola, Hellman, Koljonen & Väliveronen, 2015; Kantola, 2012)，老闆經營方式、主管管理方式，以及記者看待新聞與實際工作方式都隨之改變。Kantola (2012) 便主張傳統現代性看重的長期、階梯式工作職涯瓦解；媒體愈來

愈重視即時新聞產製，並加諸記者更多工作負荷量；年輕世代記者習慣且樂於不被單一組織綁住，這些轉變都對應著新聞工作的液態特性，也因為液態，記者與消息來源不再有緊密接觸的需要。

液態化也明顯出現在台灣新聞工作場域，讓共舞成為過去的事。舉例來說，現今老闆與主管用最少人力、最省錢方式生產新聞的作法，不只反應記者勞動條件大不如前，也讓每位記者負責路線範圍比以前大很多，嚴重影響經營消息來源的可能性。本研究受訪公關也從自己長期工作經驗，或比對之前身為記者的經歷呼應這些事實，一方面頗有同理心地描述現今媒體只在意發稿量、即時新聞、衝點閱率、不准獨漏新聞等績效評估方式，讓記者不太可能認真顧線。另一方面則指出年輕記者換工作頻率高，電視記者更讓他們記不住名字，或者或直接或委婉表達現今許多記者不太勤快、不太專業，很多時候就是打電話來要新聞資料、安排採訪，或是問到要的東西就走。

要顧的路線太廣，要配合編輯台的事情太多，從結構面瓦解了路線的傳統意義，加上記者本身也液態化(張文強, 2015; 華婉伶、臧國仁, 2011)，工作承諾降低，更重視生活品質，共同造成當下台灣記者沒有時間、不被鼓勵、沒有必要，或根本沒有認真經營消息來源的意願。當然，液態化也可能發生在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這端，一位資深公關人員便感慨年輕公關人員也在改變，工作承諾也降低，同樣追求生活品質。只不過至少就現階段來說，工作條件下降甚多、流動速度甚快的記者，所遭遇的液態化困境更為明顯，然後缺乏私下單獨聊天時間、難以交心的記者與消息來源，從原來長期共舞的理想關係逐漸轉變成一種就是因著新聞個案需求而碰面互動的工具關係。而這也促成公關人員的合法性，記者就是需要公關幫忙，取得資料、協助新聞採訪，製作出每天新聞。

二、公關建制化與共舞的瓦解

公關建制化是共舞瓦解的另一項關鍵因素。在台灣，其實早在 1950、1960 年代，政府機關便基於釐清施政理念，與民眾溝通等理由，建立了發言人、公關室等制度(林慧瑛, 1987; 張紋誠, 2003)。然而這種對應當時

保守政治社會環境，顯得被動、政令宣導，甚至形式化的政府公關階段，跟隨台灣政治解嚴帶來的激烈變化，大致在 2000 年代逐步過渡到新階段。借用 Schönhausen 與 Meißner（2016）從共同演化角度觀察新聞與公關工作發展的作法，在這公關發展新階段，新聞媒體影響力持續不墜，而且對政府、政治人物更顯批判的新態勢，讓政府機關，包含企業開始積極激活原有形式化的公關機制，更嘗試引進新作為，企圖經營媒體關係、操控新聞資訊流動，而這些作為也促成本文所提的公關建制化。

只是這裡隱藏一個在地式關鍵，雖然公關本來就有保護政府與企業名聲，免被媒體批評的功能（Cutlip, Allen, & Broom, 2005; Ewen, 1996），但類似國外學者觀察到政治記者帶有負面與反建制化的偏見，可能產製出嘲諷式報導，促成記者、政治人物與公眾間的不信任，以及嘲諷的社會氛圍；傳統媒體應有的對立監督、健康的專業懷疑主義，逐漸轉變成對政府、政治人物與政策的否定、質疑、不信任式報導（Brants et al., 2010; Lee, 2000），我們主張，台灣新聞媒體對於政府、官員的密集批判，不但呼應這種否定式報導脈絡，而且更多更嚴重的斷章取義、先射箭再畫靶、依政治立場決定新聞作法等新聞處理方式，讓台灣政治人物對記者與媒體有著更多擔心與負面觀感，然後促成這階段公關建制化尤其重視「防禦」。

訪談便發現，相較於英美研究習慣從政治人物爭取曝光、交換媒體注意的角度做出討論（Brants et al., 2010; Davis, 2009; Schohaus, Broersma, & Wifjes, 2017），或從商業主義、促銷文化脈絡觀察政府與企業如何運用公關手段取得利益（Cottle, 2003; Davis, 2013），在不排除這些目的狀況下，本研究大部分受訪公關都知道避免所屬單位、長官被罵是自己很重要的工作。也因為不想被罵，政府機關強化、也引進了許多公關觀念與機制，例如拉高公關單位層級，以副首長擔任官方發言人，力求第一時間、統一說法應付媒體詢問。另外常見的作法是聘用記者做為機要或公關事務人員，平日，藉由他們的媒體人脈經營媒體關係，面對敏感議題時，則利用他們的媒體經驗進行沙盤推演，研判即將見報的標題是什麼，該怎麼引導新聞走向。再或者為第一時間察覺議題變化、哪些事情可能被罵，以及避免已被罵的議題持續延燒，政府機關，包含民間企業機構在內，會依照預算多

寡，或委請如潤利、慧科等公司，或要求內部人員系統化監控網路與媒體輿情。受訪政府公關人員便都描述了每天早上六點三十分左右，處理行政院透過手機傳來輿情監控訊息的過程，例如轉貼到各自機關的 Line 相關組群、討論是否列管、如何因應、要不要開記者會、如何撰寫新聞稿，如何回覆上級部會長官或行政院等等。

在這種重視防禦，且隨時間學會包裝與行銷技巧的公關脈絡下，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受訪公關有著積極度差異，各單位首長重視程度也不相同，但公關建制化做得愈好也就愈加鞏固公關中介的現象。當公關人員可以滿足記者想要的資料、想約訪的官員，這些做到好、做到滿的服務不只減少得罪記者的機會，更無形間大幅降低記者與部會官員的互動需求。最後，如同一位做過多年記者的受訪公關表示，記者罵得兇，愈不講道理，公關人員也愈不敢讓主子接近記者，防禦工事就得做得更好。又或者如同另一位擔任政治人物機要，本身也常出現在新聞中的受訪者，懂得幫忙老闆嚴密防守，亦懂得保護自己的技巧，小心發言避免被抓到語病，嘗試透過影像方式留下紀錄以備記者斷章取義時可以做出澄清。這些受訪者經驗一方面再次說明防禦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更為關鍵的是，愈多的防禦作為也愈是阻斷記者與消息來源間親身互動機會，然後記者也隨之失去與消息來源共舞的可能性。

三、互動關係的失衡與重組：更加具有主導意志的消息來源

共舞過程中，誰主導共舞是個關鍵問題，而這種二分式提問經常帶引出二分式的回答。部分學者強調媒體與記者的主導力量 (Strömbäck & Nord, 2006)，例如從新聞產製端出發，Tuchman (1978) 提及的新聞網便凸顯媒體與記者透過布線所展現的主導權，或者順著媒介化概念，當消息來源需要迎合新聞產製邏輯才能達成新聞發布等目的，便也同樣意味媒體與記者主導的態勢。相對於此，另一部分學者強調消息來源的主導力量。例如藉由 Hall 等人 (1978) 主張的首要定義者 (primary definers) 概念，認為記者被權勢消息來源帶去關心某些議題，接受權勢者定義議題的方式，然後影響新聞再現。

基本上，二分式回答有助了解記者與消息來源的各自影響力，以及為何具有影響力，但在雙方都想主導的實務世界，問題終究是複雜的。例如記者的確可以選擇消息來源，不過選擇消息來源的工作常規卻反轉了記者主動性，促成依賴官方消息來源或菁英的事實(劉蕙苓, 1989; Brown, Bybee, Wearden & Straughan, 1987; Sigal, 1973; Whitney, Fritzier, Mazzarella, & Lakow, 1989)。再例如 Reich (2006) 也認為誰帶舞是複雜問題，他主張在發現新聞的階段，消息來源力量比較大，在資訊收集的階段，記者主導性強。Larsson (2002) 則描述為創造或維持必要的權力平衡關係，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保持在一種動態狀態，雙方會在設定好的戰術空間內允許對方暫時取得好處，更會在需要時進行攻擊與防禦活動，可是一旦某方採用過強的攻擊策略，超過戰術空間設定界線，導致權力失去平衡後，雙方便得重新建立新的平衡關係。

在「誰帶舞」本身便複雜的狀態下，我們主張，儘管學者們各有主張，但對新聞專業來說，這個提問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它明白對應記者應該努力主導共舞，藉此維護新聞專業的長期期待。或者說學術場域對於這個議題的持續關心，也像是在持續提醒記者們至少需要具有帶舞的意志。然而對應前面有關公關建制化與新聞工作液態化的描述，以下兩個相互關連的命題共同翻轉了新聞專業的長期期待。首先，當記者不需經營路線也能跑出媒體要的新聞，他們便也沒有堅持自己帶舞的必要，甚至堅持帶舞只是徒增困擾。然後，記者不再堅持並不意味消息來源端也放棄堅持，相反地，各種公關建制化作為便顯示著消息來源企圖主導新聞產製的意志，甚至更進一步，消息來源端展現出比以往更想利用媒體經營自己形象、操作議題的明確企圖。因此儘管聽來刺耳，當下實務場域默默出現記者退守、消息來源透過公關人員不斷進逼的現象。如果再算上置入性行銷這種強勢作為，拿人手軟的邏輯讓記者的退守更是明顯。

在實務場域，記者退守是一種跟隨媒體環境轉變的識時務行為，只要公關人員願意幫忙，誰主導便無關緊要，同樣可以完成媒體交辦的任務，而且可能更有效率。只不過對新聞專業來說，記者退守，失去主導意志是十分嚴峻的問題，代表記者讓出建構新聞的權力，成為傳聲筒或宣傳工具。

而帶著這種擔憂與遺憾，消息來源聯手公關共同對上退守的記者意味共舞的瓦解，展現一種公關中介、消息來源企圖主導的舞台展演樣態。

參、舞台與舞台上的角色

面對記者與消息來源的意志此消彼長，以及公關工作的設計成分，我們主張「舞台展演」是更適合描述當下的比喻。舞台上，公關、消息來源與記者大致依循各自腳本化的角色規則進行互動，然後對應著消息來源主導新聞生產的企圖。不過這個受 Goffman (1959) 啟發的概念，不表示舞台上的三方行動者就是照本行事，不真誠、缺乏人情成分。相對地，這種日常發生的展演更能捕捉日常生活的動態、模糊性格，反映行動者大致了解自己目的、習慣性依腳本行事，卻沒有被腳本完全框限的真實世界。

一、舞台展演：腳本化的舞台互動

互動存在著規則，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亦是如此。透過多次互動所發展出的混合關係（喻靖媛、臧國仁，1995）便像是共舞時的互動規則，在混合關係中，無論是基於信任要素（羅玉潔、張錦華，2006；Larsson, 2002），或華人社會強調的人情（喻靖媛、臧國仁，1995；黃彥翔，2008），都讓雙方願意在「這次你給我一些，下次我還你一點」之間持續共舞。然而，共舞瓦解意味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需要新規則。面對當下這種沒有時間發展混合關係，卻比以前更強調即時性、需要完成更多工作，更可能擦槍走火的困境，實務場域似乎並未亂了方寸，而是巧妙因應環境演化出一種新的規則：記者、公關人員與消息來源大致依循腳本化角色進行互動，做出反應，也藉此維繫日常工作中的三方關係。

換個說法，由於工作型態使然，即便新聞環境再液態化，記者與消息來源，特別是記者與公關人員的互動往往也不是一次性的，彼此都還是理解未來可能遇到對方、需要對方幫忙。這種狀況形成一種互動的弔詭，一方面，大家很難再如同過去可以依靠時間逐步建立起信任、人情默契；但另一方面，大家卻又難以毫不猶豫地進入標準工具關係脈絡，就是計算當下得失來決定如何互動。在這種弔詭狀況下，腳本化規則像是巧妙搭配簡

單的人情使用，創造一種彈性空間，幫忙三方既可以依循各自目標、工具理性行事，同時又能避免依賴標準工具關係進行互動時的尷尬，有效節省時間與降低衝突發生機率。

在接續說明三方各自的腳本化角色前，先說明「舞台展演」三項重要特徵。第一，相較於以往認為好記者平日應該多花時間經營消息來源，以備關鍵時刻寫出好新聞，「舞台展演」凸顯當下記者、公關與消息來源集中前台互動，後台相對不重要的現狀。集中前台互動的現象實際對應當下三方行動者期待順利完成手邊工作的工具需求，而沒有太多台下互動的事實則回頭解釋了當下缺乏獨家新聞、深度報導的原因。第二，舞台強調腳本化，除角色的腳本化外，還包含處理新聞事件時的腳本化。透過兩種腳本化的引導，可以減少衝突與意外發生，有助三方順利完成各自工作，大家都快樂。也因此，舞台展演與腳本化凸顯三方行動者為產製新聞互動時的合作構面。第三，「舞台展演」凸顯當下消息來源企圖主導、公關人員從旁協助的新聞產製特徵，但這並不表示記者就是順從公關安排。為完成工作，記者還是會有屬於自己應對公關的臨場策略；有時候，他們可能就是不滿地發脾氣、挑剔公關安排；舞台上還是可能存在具有傳統帶舞意志的記者；某些特殊議題或情境，還是會出現記者試圖跳過公關，想要直接與消息來源接觸的情形。又或者，工具性格濃厚的舞台並不排除信任、人情運作的可能性，有些對味的組合相處久了，還是可能成為朋友，從台上互動延續到日常生活。

二、提供服務的公關

公關不是新概念，其發展與新聞環境的變化具有緊密連動性。Schönhagen 與 Meißner (2016) 便從共同演化角度主張公關之所以興起，與媒體出現錯誤報導和負面報導有關，同時亦涉及政府與企業察覺自己需要利用媒體接觸、影響民眾。Lee (2000) 則主張，因應媒體失去對政府事務的興趣，以及媒體採用的否定式新聞報導方式，官員應該要有相對應的公關策略，例如促銷政策議題的能力；了解媒體邏輯，與記者互動的能力。這種與新聞環境連動或共同演化的狀態，讓公關具有濃厚的工具與實用本

質，並且在台灣近年公關建制化過程中，重新設定了公關於新聞產製過程中的角色。

基本上，基於接觸記者、提供通稿式消息給記者的工作職責，公關人員可以被視為廣義的消息來源，或者在某些狀況下，公關人員也的確可能因為提供獨家消息給某位記者而成為真正的消息來源，不過無論是廣義的或真正的消息來源，「消息來源」並不足以凸顯當下公關人員在三方關係中的角色特性。前者，一直都是公關人員的份內工作；就後者而言，除了想要取得更多曝光機會的政治人物媒體機要外，公關人員都明確了解提供獨家新聞的風險：得罪更多記者，也可能因為洩漏消息讓長官不滿，所以不會輕易嘗試。

相對於單純的消息提供者角色，我們發現，對應台灣公關的防禦本質、公關人員被組織所雇用等事實，受訪公關們都清楚知道自己是受組織雇用，專門負責與記者互動、折衝的工作，然後這種身分實際促成公關人員與記者之間的相互依賴卻又不信任（White & Hobsbawm, 2007），共同處在一種相互了解對方做為工具性存在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基於現今記者需要快速取得所需資訊、需要採訪端配合許多瑣事等原因，本研究發現，當下公關人員很大一部分工作內容在於設法去知道記者需要什麼，在記者提出要求時，盡量提供所需服務。例如協助記者約訪單位主管、取得新聞背景資料、出差採訪、拍攝新聞畫面，也包含代訂車票等瑣事。受訪公關便配合各種例子，描述服務記者是自己份內的事，公關就是要有求必應，想辦法把記者要的東西生出來。然後在記者提出要求，公關滿足要求，而且盡量提供更多服務的邏輯下，「提供服務」搭配下節討論的禮貌規則，共同標示著公關人員在舞台上的腳本化位置。

基本上，服務透露著權力不對等。受訪者程度不一地表達有些記者不好服務、態度不佳，其中一位更使用「蹂躪」這個名詞，但公關人員明白理解自己做為一種工具性存在的事實，幫忙他們化解因記者過度要求而產生的不滿與敵意。更重要地，在雙方都沒太多時間互動、經營彼此的同時，這些看似由記者佔便宜的服務提供一種難得互動機會，實際架構起記者與公關人員的互動，並且在三個相互關聯的層面有利於公關人員完成工作。

第一，服務創造記者依賴公關人員與欠人情的機會，服務時的互動也實際提供雙方相互試探、建立基本工具性信任的機會，當記者開始相信某位公關會滿足所需，也就不會找麻煩，相對地，公關人員相信某位記者不會出賣他，則會繼續提供服務。在工具性與液態化的新聞工作脈絡中，這種信任關係可能顯得脆弱，但卻也是舞台運作的基礎，衍生出腳本化可能性。第二，服務促成腳本化的可能性。記者需要服務的習慣反過來意味他們依賴公關的事實，這種連結用隱沒、卻決斷方式將雙方帶引至舞台腳本關係中：公關腳本地展現禮貌、有效提供服務，記者則腳本地做個人戲、不搗蛋的角色，接受公關中介的事實。然後各取所需地完成各自的工作。第三，服務巧妙地讓公關人員取得中介或積極調控新聞的機會。例如代為約訪時的簡單互動可以幫忙公關人員掌握記者要做的新聞是什麼，藉此與長官、受訪對象事先進行沙盤推演再出來面對記者。在記者要求某些新聞資料時，提供他們經過整理、部分保留的資料，可能引導新聞走向。遭遇負面新聞或想推銷特定新聞議題時，透過公關人員中介機會，可以將事先設計好的事件處理腳本借力使力地夾帶給記者，影響新聞產製。

公關人員腳本地提供服務的確有助完成自己工作，不過這並不代表公關人員願意無限制提供服務，當記者過度要求，造成權力關係過度不平衡，他們也會發火。借用 Larsson (2002) 的戰術空間概念，公關人員像是基於台灣媒體現狀與自己職責，一方面允許記者較大權力空間，另一方面則以服務做為自己的戰術策略，在看似不平衡的權力關係中，藉此取得平日的相安無事，必要時更可以主動出擊讓記者願意配合新聞操作。另外，對於有企圖的公關人員來說，把記者服務好更能夠在長官面前鞏固自己的角色地位。

最後，除了腳本地服務記者，公關人員為組織雇用的事實也意味他們更得面對長官，看長官意圖決定做什麼、怎麼做，倘若長官想要開戰，也得硬著頭皮得罪記者。舞台同時預設著他們做為幕僚的腳本角色，只是幕僚角色有多少發揮程度，又該如何發揮，差別在於長官決定用多少程度退居第二線，以及對自己有多少信任。受訪公關清楚理解這個道理，幾位頗受青睞的受訪者就明白表示長官重視公關角色、對自己信任，是自己能

做好公關工作的關鍵。

三、隱身的消息來源

公關人員透過幕僚身分建制化的事實，指向舞台上有關消息來源的腳本化安排：平日的隱身化。當然，消息來源還是新聞產製的關鍵，不可能退出舞台，只是在當下台灣，除了自己想要大量媒體曝光的人物，我們發現在避免說錯話、不想被嘲諷等防禦脈絡下，更多消息來源，例如政務官員、各級公務員、企業老闆，大多時候選擇站在燈光以外的地方，顯得被動、低調、沒有聲音，必要時則在安排下現身面對記者。

（一）隱身在燈光之外

舞台上，消息來源選擇腳本化隱身並非沒有緣由，隱身像是消息來源與新聞環境改變共同演化的結果。一方面類似英美經驗，當政府機構想要確保政策對外一致性、主導新聞事件定義權時，避免記者自由接近官員自然是控制資訊流動的積極手法 (Davis, 2003; Franklin, 2003)。Manning (2012) 就主張現今財經記者愈加依賴公關代替以往與資深金融人士互動的作法，便允許金融機構更有效地控制資訊流動，記者因此失去取得其他新聞線索與發掘隱藏議題的敏感度。二方面對應防禦需求，當政府高層官員或企業老闆引進專業公關代理人機制後，上行下效的結果也讓轄下公務人員或員工選擇進入隱身狀態，不會任意與記者透露消息，也不會自己站出來受訪，以免被長官看到惹上麻煩。三方面在液態化脈絡下，靠公關人員就能完成工作需求的記者，也就沒有主動開發消息來源的需求，相對地，缺乏信任感也讓消息來源不願、也不敢與記者接觸。

因此，在記者習慣由公關人員提供服務後，消息來源平日便也取得在舞台上遠離燈光的可能性，甚至因為更細緻掩護而被帶至記者無法接觸的封閉後台。舉例來說，得利於報社減少人力，部會記者得兼顧許多局處單位的現狀，當下讓記者集中待在部會記者室，配合門禁與電梯卡等措施，便有效降低記者在部會大樓辦公室間任意走動，以及逕行與外埠辦公室人員接觸的企圖。再加上諸如安排各級長官、外埠官員親赴記者室說明新聞

背景等貼心服務，各種作為不只幫忙記者不用到處跑便能完成新聞，更實際成就一種看似自然的完美隔離計畫。記者與消息來源被有效隔絕開來，消息來源平日得以隱身，不被接觸，同時，認真的公關也能透過掌握記者的流向，掌握有哪些即將曝光的新聞，可以預做安排。

（二）設計下的現身

Schohaus 等人（2017）發現，公關人員會在自己服務的政治人物上談話節目前進行不少事前準備。例如與節目製作人緊密互動，事先知道訪談方向、有哪些其他來賓、要求事先觀看節目中會播放的影帶，以免政治人物面對尷尬、不舒服的情境。基本上，Schohaus 等人（2017）利用這些事前準備說明公關與製作人間的合作關係，以及政治人物在節目中的自然表現是經過幕後協商規劃的事實，然而我們主張，這些事前準備工作其實也正說明著公關工作的設計本質，而且不只是參加談話性節目如此，在消息來源一旦有面對媒體的必要時，其現身也經常是經過設計的。

整理受訪公關的描述可以發現，這種設計可以相當簡單，例如只是決定要不要出來面對記者；和官員簡單討論或交代說些什麼；決定在哪裡受訪，好比破案新聞會在清楚標示警察局名稱的背板前發言。這種設計也可以是精細的，例如設法為長官塑造出學者不擅與記者互動的形象；依訪談議題事先模擬相互攻防；在鏡頭前道歉時，建議誰站上台道歉、九十度鞠躬多久、要不要接受記者現場提問、哪家媒體記者來提問等。透過設計下的現身，公關可以盡力掌控與預測即將發生的事，消息來源可以依照腳本更安全地站在舞台上，依照之前沙盤推演說話，減少語病或內容自相矛盾的機。也因此，當長官特別有表演慾、喜歡脫稿演出時，公關人員便得做好跳出來擋子彈的準備，進行善後工作。或者，也因為公關與消息來源都想要控制事情走向，愈想控制愈是擔心，也愈是促成更為極端的隱身策略，例如嚴厲執行單一窗口發言人制度，或者讓官員簡單找個理由躲起來，由公關人員扛風險、做箭靶便成為最極端的设计與控制方式。

也因此，就在現今政治人物對媒體帶有敵意，卻又需要媒體，經常將如何與記者互動納入平日工作範圍（Davis, 2009）的狀況下，就防禦來說，

消息來源藉由公關人員幫助自己平日得以隱身，必要時在設計下現身，是安全、有效應對記者方式。相對地，就攻擊而言，回應當下強調主動行銷、形象包裝的促銷文化脈絡 (Davis, 2013)，公關的設計本質更是政治化妝師的本質。最後，回到本研究關切的新聞產製工作，無論是防禦或攻擊，消息來源透過公關人員幫助，平日隱身，設計下現身這種舞台腳本安排，透露著現今記者愈難接觸到部會官員，愈難取得官方發言以外消息的事實，而新聞產製也因此愈受消息來源端所主導。

四、「入戲」的記者

日常生活展演中，當有人不入戲，表現出劇本外的行為會危害展演進行 (Goffman, 1959)，相對地，在消息來源主導的舞台上，無論設計了什麼腳本，公關有多努力，記者不配合演出便也沒有意義。入戲的記者，是舞台展演的最後一塊拼圖。

理論上，記者不應配合舞台演出。即便有必要，舞台也應該是由記者搭建，因為一旦進入消息來源主導的舞台，難免成為別人劇本的一部分。然而儘管理論如此期待，現實卻顯得悲觀。記者退守、消息來源企圖主導這種結構性轉變，不只瓦解共舞，更瓦解以往研究描述的既競爭又合作、既衝突又依賴的關係 (Blumler & Gurevitch, 1981; Davis, 2009; Larsson, 2002; Schohaus et al., 2017; Wolfsfeld, 1984)。或者說，當新聞專業與獨家新聞不再重要，記者自然不再需要辛苦維繫既合作又衝突這種複雜關係；當記者習慣公關人員存在，習慣藉由他們幫助完成每天繁瑣、零星工作 (張文強, 2015)，那麼，合作，便也理所當地成為互動關係的核心，有利大家各取所需。

前面有關公關人員提供服務的討論進一步解釋了這種情形。我們不難發現，雖然受訪公關有時會對記者要求感到不耐煩，但他們更現實地知道只要服務夠好，記者就不太會找麻煩。對公關人員而言，這項交易算是划算，因為這正是自己做為公關的職責所在。對記者來說，在新聞工作液態化與工具化脈絡下，接受服務更有明顯好處，可以達成媒體對於效率與工作績效的要求，而且早點完成工作，能夠擁有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 (張文

強，2015）。只不過習慣成自然後，記者便也被拉入消息來源企圖主導的舞台，有意無意進入配合演出與人戲狀態。

然而舞台上，記者是複數，所以需要的是集體配合入戲，而當下主客觀環境正好提供了支撐集體配合的基礎。資深實務工作者針對自己熟悉的新聞產製工作進行的研究（高政義，2008；唐德蓉，2012；張駿遠，2012）便發現，媒體要求不能獨漏、嚴苛的勞動條件、通訊軟體的出現等因素，促成當下記者因為需要相互支援而產生濃厚集體感。電視記者尤為明顯，集體約訪與聯訪、交換新聞資訊與角度，甚至交換拍攝好的新聞帶。另外，一位受訪者就自己記者工作後期，以及之後擔任政治人物機要的經驗也表示，待在記者室的平面記者也會互通有無，或由資深記者帶領分工進行採訪，再或者也會同仇敵愾地合作抵制、修理某位公關。

在這種狀況下，無論是公關刻意引導，或記者間主動形成集體規約，一旦記者們習慣消息來源隱身、公關人員提供服務這種新聞產製方式，便完整形成三方行動者共同配合舞台腳本演出的情形。然後記者習慣向公關人員要資料、習慣由公關人員協調官員出來受訪，用官方說法做新聞的方式，實際促成某則各家電視台都有播出的社會新聞剪接自同一段警方提供的監視器畫面、引述同一位警官在聯訪時對於新聞事件的統一說明，但是就在這些官方畫面、官方說法幾乎佔滿時間的同時，卻缺乏來自其他管道的新聞現場畫面、沒有其他警察或關係人的非官方說法，更沒有匿名消息來源透漏的反面訊息。或者再進一步對應有些受訪者描述自己大致能夠掌握隔天是否會有新聞見報，會寫些什麼；滿意於刊登的新聞使用了自己所提供的資訊、說法與圖片，與自己想預想的角度差不多，以上種種共同說明著當下公關人員透過服務中介與調控新聞的成效，在雙方合作成功之際，記者們也有意無意地站上消息來源主導的舞台，在舞台上腳本化地入戲。

「入戲」是重要的，而維繫記者願意入戲則是公關的工作，不過因為入戲終究屬於默契般的事物，所以理論上記者也有選擇不入戲，以及如何入戲的權力與可能性。在舞台上，入戲的確可以幫忙記者順利完成工作，但有時候選擇不入戲，可以促使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做出更多讓步。或者

不入戲更可以是記者專業意志的展現，如同一位受訪公關直接點名某位記者有「記者魂」，因為在他提供服務過程中，這位記者會有較多的堅持與質疑。也因此，在入戲與否，以及如何入戲之間，我們主張，堅持「記者魂」應該是需要被鼓勵的事，而如何幫助當下記者保有做為專業記者的意志，是學術領域需要思考的方向。

肆、舞台的日常

舞台的日常是描述「舞台展演」新聞產製的另一重要構面。而消息來源企圖主導，卻經常選擇隱身，將工作交由公關人員代理的狀態，又對理解舞台的日常具有兩種關鍵意義。首先，就新聞產製來說，消息來源仍是關鍵，只是大多時候他讓出舞台空間，由公關人員與記者做為舞台上的主要行動者。其次，於自己搭建的舞台上，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沒有鬧場的理由，但理論上不屬同一陣營的記者則沒有配合的理由。在這種狀況下，除了透過「服務」嫁接起兩方主要行動者的舞台日常互動，舞台日常展演順暢與否還涉及兩項關鍵：禮貌法則，以及公關對於新聞工作的精熟。前者具有維繫舞台日常和諧的基本功能，後者讓公關人員可以將舞台經營得更為細緻與順暢。

另外，儘管我們主張三方行動者集中台前互動，但完整的舞台日常還是包含了台下活動。理論上，三方行動者都可以運用台下活動支援前台演出，不過消息來源隱身、記者的退守與入戲的現狀，卻共同凸顯公關人員經營舞台的角色，讓他們更為需要、也更主導了台下活動。也因此，本節將先說明維繫舞台日常的兩項關鍵，其次將從公關人員的視野討論台下活動。

一、舞台日常運作的兩項關鍵

（一）前台禮貌與舞台日常的和諧

相較以往記者與消息來源親自共舞、親自管理共舞節奏，當下，公關人員在舞台上面臨一種工具性困境。他們並非事件當事人、沒有長官的決定權，而是基於職責出來面對記者，但麻煩的是，他們很難就是拿著標準

的工具性法則，應對那些同樣帶著工具目的而來的記者。然而我們發現，為了順利完成工作，受訪者像是抓準自己角色特徵，透過禮貌法則巧妙克服了標準工具關係的困境。例如「某某攝影大哥」這類敬語式稱呼是他們日常語言一部分、過年過節時傳送簡訊或貼圖問候，或者碰到記者未能如願而發脾氣時，知道該如何道歉、彎腰，自己想辦法吞下去。也因此，好脾氣、人際關係能力、使命必達成為公關人員的關鍵詞，由記者轉任的受訪公關對於禮貌法則更有感觸，與過去相反的工作情境讓他們更容易看到記者的過度要求，自己卻又得基於現今工作職責禮貌地服務起記者。

就舞台日常運作來說，公關人員腳本化地展現禮貌是重要的。簡單來說，公關人員的禮貌往往會帶引出記者的禮貌，然後在彼此間形成一種軟化版的工具性關係，大致維持舞台日常運作的基本和諧。深入來看，公關人員的服務與禮貌會促成「記者入戲」這塊舞台展演的最後拼圖，然後跟隨拼圖到位，三方行動者對於舞台的共同承諾會再引導出 Goffamn(1959) 描述的識相行為：大家按照各自角色安排行事、不去戳破彼此的演出腳本、對某些意外或腳本之外的細節而不見。也因此，即便記者知道採訪對象在記者會的發言是沙盤推演過的，公關人員知道某位記者在做某則新聞時稍微破壞了採訪默契，但三方行動者為顧全舞台展演大局而做出的識相行為，以及依照前面提及的腳本化原則進行舞台互動，特別是再加上公關人員願意委屈，禮貌地習慣某些記者的頤指氣使，這些因素共同創造了舞台展演的異常和諧。也因此，當下新聞產製並未如同本研究最初想像，會因為記者經常攻擊，消息來源端必須防禦而充滿衝突、劍拔弩張。相反地，除去編輯台長官硬是要求記者踩著紅線偷拍、用有損企業老闆名聲的方法做新聞，或反過來，自己長官忍不住與記者發生衝突、挑釁記者，大多時候在公關中介的舞台上，沒有風雨連連，而是日復一日的相安無事。

（二）精熟新聞工作與舞台的細緻經營

妥善了解與因應新聞媒體作業方式被認為是公關人員需要具備的能力，公關書籍（例如，卜正珉，2003）便有著相關提點。我們在研究訪談過程中也程度不一地發現受訪公關能夠描述新聞工作流程、媒體選取新聞的標

準、各家媒體屬性，其中幾位對細節的掌握更是令研究者印象深刻。

舉例來說，一位受訪者便摻雜其他新聞類型，描述爆料、投訴這類電視新聞的處理方式。他清楚知道記者一定會要官方回應，得有官員出來面對鏡頭；攝影記者需要新聞事件的模擬場景，以及可供使用的空景畫面。對應他所知道為數更多的新聞工作細節，這位受訪者會依照事件特性與嚴重性，事先協調由哪位官員出來受訪、準備好符合單位立場或想要澄清的資料、規劃好拍攝動線與空景拍攝、幫忙找人充當顧客以利模擬場景畫面的拍攝，然後巧妙利用截稿時間這項因素，將早上時段的媒體聯訪安排在十點三十分。受訪者解釋當記者有問到適合的官員、問到要問的話、有拍到或索取到可做新聞的畫面，再加上訪問完已近發稿時間，記者也就沒有時間、沒有必要再去訪問其他立場的人。如此，不管記者是否抱持友善態度而來，這樣安排至少可以讓官方說法佔據新聞報導的大部分時間，甚至成為唯一發言者，又或者得以掌握報導主軸。另外，此位受訪者也以一則當天見報新聞，實際說明自己如何轉換掉原先較不友善的報導角度。他先是趁記者來要資料的時機，打探到新聞預設角度會對所屬機構有所傷害，然後利用報紙專題製作的需求特徵，例如準備時間充裕，需要較多資料與採訪對象等，技巧性地推薦記者另一項新聞角度，並且提供相關資訊，甚至準備好專家學者人選，由專家學者幫忙他們發言。

受訪公關對於新聞工作細節的熟稔，除去部分公關人員由記者轉任這項原因，還來自政府單位幾乎年年舉辦的媒體公關課程、刻意向資深記者討教，或純粹自學而來。但無論原因為何，這種熟稔一方面幫忙受訪公關精準地回應記者所提要求，記者也能收到切合需求的幫助，不必反覆要求，事事交代，然後於平日可以輕鬆寫意地維持了舞台日常和諧。另一方面這種熟稔將公關人員帶到有利戰略位置。受訪公關在所屬單位年資遠比記者高出許多的事實，讓他們不只對該單位人事、工作內容瞭若指掌，甚至比記者更加了解該路線記者生態與工作訣竅，然後促成公關人員能夠提供充分迎合記者思維的服務，更細緻地進行舞台經營。如前述受訪者的用語「你要寫之前，我就幫你吧論述架構清楚」，便無形、成功引導或轉移了新聞專題的角度。

最後，理論上，記者也應該熟稔掌握主跑路線相關細節，藉此取得新聞產製時的優勢，而過去某些資深記者對於路線的長期經營，便具有如此效果，只是跟隨新聞工作液態化，以及勞動條件大幅降低，各種主客觀條件讓這種熟稔變得不可能。然後記者不得不交出原本就屬不易的主導權，反過來證成公關人員主導舞台日常，以及公關中介、調控新聞產製這項殘酷事實。

二、台下的活動

(一) 人情與金錢的運作

在工具化、液態化新聞產製情境，即便有受訪公關表示自己就是禮貌應對記者，工作時互動而已，但基本的人情活動仍具一定重要性。例如受訪公關會配合現下記者集體跑新聞，電視台又跟隨報紙跑新聞的事實，特別去經營大報記者或路線聯誼會關鍵人物，讓自己可以在無法認識、也沒有必要認識所有記者的狀況下，有效掌握其他記者動態。或者儘管有限資源，還是會配合年節聚餐、請記者擔任年度媒體訓練課程講師等簡單施惠動作，盡量做人情。

公關人員如此，加上大部分消息來源也懂得給記者簡單人情，促成記者與公關人員有著更好的舞台互動。公關人員可以更有把握於記者不會沒事找麻煩，寫負面新聞時也會先說一下，必要時還可以討個人情，軟硬兼施地促成記者刪掉某句話、調整一下角度，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甚至出現記者得知勞動檢查消息後，主動通知公關人員趕緊做好準備的例子。當然，不像共舞所培養的堅實人情，當下人情活動顯得簡單、脆弱，一旦各自長官做出特定要求，還是得選擇配合長官，得罪對方。

除人情外，本研究發現，雖然許多公部門受訪者提及自己「武器」比不上民營企業，但大家都知道有錢撐腰的好處，當媒體主動提出編業合作，缺乏預算便也失去經營媒體與記者關係的機會。或者反過來，有預算的政府單位亦實際懂得「媒體採購專業服務委託案」的影響力，對應許多置入行銷相關研究（林照真，2005；陳炳宏，2005；羅文輝、劉蕙苓，2006）的擔憂，在預算執行期間，記者會配合業配單位的新聞要求，自然迴避負面

新聞，甚至主動幫忙化解。就實務論實務，業配新聞有助消息來源端進行新聞操作，但在業配新聞通常低調進行的狀況下，我們需要注意金錢掌控舞台展演的程度可能比想像中更為全面。

（二）餵新聞

一直以來，資訊津貼是消息來源的重要工具（Berkowitz & Adams, 1990; Gandy, 1982），而基於時間與成本考量，新聞工作也會接受資訊津貼，然後造成記者依賴消息提供者，影響新聞多樣性（Berkowitz, 1991; Brown, et al., 1987）。然而回應當下台灣公關所具有的防禦本質，以及公關人員成為記者主要接觸對象，我們發現，雖然政治屬性公關人員偶爾會以獨漏與小獨家做為警告或鼓勵特定記者的工具（游淑惠，2015），但本研究受訪公關人員卻也明白知道將真正的獨家新聞當做給特定記者的資訊津貼，一定會引發其他記者反彈，不過有意思的是，他們並沒有因此放棄資訊津貼這項工具，而是相當因地制宜地策略性調整了傳統作法，讓「餵新聞」成為支援舞台展演的重要台下活動。

例如受訪公關知道當下記者需要足夠資訊填補即時新聞缺口，即便這些資訊很零碎、不重要；編輯台總要事件現場畫面，即便這些畫面不清楚或僅是事後畫面；編輯台不排斥通稿新聞，卻經常要求記者寫通稿時要有不同角度。藉由知道記者們會因為這些事情感到苦惱，公關人員發展出各種餵新聞方式，例如警方會提供執勤時的照片或動態影像；暑期每天固定提供電力備轉容量率燈號、連續多少天最高溫度超過多少度等資訊。更積極的公關人員平日還會準備一些小題目，在記者缺稿時提供給他們參考。

我們發現，儘管記者經常不見得使用這些資訊，很多時候是白做工，但關鍵在於先把東西準備好，一旦遇到記者有實際需求便也成為公關人員影響舞台展演的工具。然後如同一位受訪者赤裸描述「被餵飽的記者也就不會咬人、不會攻擊人」，餵新聞這個動作同時解決了記者與公關人員的困擾。只是如同 Lewis 等人擔憂（2008）未曾減少的資訊津貼行為會影響新聞工作獨立性、第四階級傳統，就新聞工作來說，雖然餵給記者的不是重大消息，餵新聞這項活動也無形間幫忙公關人員經營了舞台的日常。

（三）進對方的後台

「舞台展演」對應一種記者難以直接接觸消息來源的困境。平日，由於新聞還是可以順利產製出來，所以這個困境不致帶來太大問題，不過當重大新聞發生或關鍵時刻，找不到新聞當事人或適當消息來源便會成為大麻煩。為了解決這種麻煩，也就造就當下編輯台長官自己拿起電話跑新聞的情形，由編輯台內的長官取代舞台上記者，繞過公關人員直接進到消息來源聚集的後台。相對地，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同樣也了解有些事情需要直接找記者的長官（游淑惠，2015；詹慶齡，2011），所以他們必要時也會繞過舞台上的記者，直接與編輯台長官溝通。

也就是說，進入並經營對方後台，是公關人員、消息來源與編輯台長官都會進行的後台活動。對公關人員來說，雖然維持舞台日常運作佔據主要工作時間，得設法讓記者滿足於舞台日常，也局限於舞台日常，但有企圖的公關偶爾會離開舞台，直接找上編輯台長官，與他們建立交情。雖然這麼做會增加自己工作量，對舞台日常展演也沒有直接幫助，但關鍵時刻透過電話改變新聞寫法、甚至撤下負面新聞，不只有助完成工作，更可以在自己長官面前建立起價值。相對地，對編輯台長官與消息來源來說，儘管前者平日待在編輯台，後者選擇在舞台上隱身，但有意思的是，無論基於對方所擁有的權勢位置，或是因為雙方認識甚久，讓他們容易進入對方後台，取得各自利益。

在這種狀況下，原本屬於記者與消息來源的新聞採訪工作，於關鍵時刻變成高層對高層的作為，而以往記者與消息來源研究引用的面子、社會資本概念（黃彥翔，2008；羅玉潔、張錦華 2006），當下更適合解釋這種發生在高層長官間的互動。另外，公關人員也了解可以不必焦慮於年輕記者難以經營，因為年輕記者可能隨時離開，所以輕輕拉住即可，重要的是，倘若他們想在關鍵時刻影響新聞產製，關鍵便在於與編輯台長官、總編輯，甚至媒體老闆保持好關係，所以年節送禮、飯局都不能省略，甚至會更費心準備。當然，這種高層對高層的新聞產製方式也促成基層記者成為每天站上舞台看似忙碌，卻被邊緣化成跑瑣碎新聞的勞工，而這或許也是後續研究值得追蹤的新構面。

(四) 社群媒體的使用

隨著社群媒體興起，學者開始關心記者與消息來源在推特 (twitter) 上的互動，及其產生的影響 (Broersma & Graham, 2012, 2013; Ekman & Wildholm, 2015; Vobič, Maksuti, & Deželan, 2017)。在社群媒體使用習慣不同的台灣，臉書的使用具有推特的部分功用，配合上台灣記者習慣以網路素材做新聞這項事實進行觀察 (劉蕙苓, 2013)，我們不難發現，記者也習慣在臉書上找新聞，網路新聞更會直接截取臉書文字做為一部分。政治人物則在上面傳布消息，也與選民互動、行銷自己。

不過，就在前些研究沿用共舞脈絡的同時，我們主張，社群媒體的使用也充分對應當下消息來源企圖主導、公關中介的新聞產製現狀，然後讓其具有台下活動功能。記者就是「剪下、貼上」政治人物推文的工作方式，不只讓推特上的互動缺乏「透過對話進行協商」的精神 (Broersm & Graham, 2013)。在勞動條件不佳、液態化的新聞產製情境內，類似現今記者不太查證，而是改寫公關人員提供的資料 (Sissons, 2012)，或者呼應記者就是接受公關人員完成服務的習慣，政治人物貼文、發布消息，而記者就是剪下貼上的作為，也對應著當下記者退守，公關人員與消息來源聯手利用社群媒體支援舞台展演的企圖。

在這個議題值得後續研究追蹤的狀況下，這裡大致可以發現，政治人物與公關人員透過社群媒體放話、進行政治攻防等行為，便帶有利用臉書做為後台活動，支援舞台展演的成分。我們可以藉由一位受訪政治機要回應某次競爭對手攻擊的作為加以說明，這位機要理解現今記者可能從臉書上找新聞線索，也理解自己親自做出反擊可能會有風險，因此他技巧地讓自己更不具新聞性的同事在私人臉書上貼文，回應競爭對手對長官的攻擊，而這種後台運作、看似間接的貼文，也果然成為隔天新聞，順利地讓自己陣營聲音藉此呈現。另外，受訪基層公關雖然較為缺乏相關經驗，但利用臉書做為後台活動的狀況也具體展現在一位受訪公關經營某群交通迷的例子之中。藉此，他細緻改變了這群交通迷以往看到問題逕向媒體爆料的習慣，當下，則會直接通知這位公關，再由他轉給負責同仁，盡快修改，減少被媒體報導的機會。或者在特定負面事件上，這群迷也會跳出來在 BBS

等社群媒體上幫忙說話、做出專業解釋，然後影響看 BBS 找新聞的記者。也因此整體來說，公關人員經營社群媒體的作為，雖然發生在舞台之外，也可能做白工，但透過對於新聞工作的精熟，細緻掌握媒體口味與工作流程，社群媒體上活動也可能幫忙他們從源頭控管新聞，達成影響新聞產製的目的。

伍、結論：設計好的透明度

在傳播學術場域早已習慣記者與消息來源研究，並且利用這組對偶關係理解新聞產製的脈絡下，本研究描述了一種由記者、消息來源與公關人員三方構成的「舞台展演」樣態。在論述完這種新樣態後，本節將站回新聞專業立場提出批判，以此做為本研究結論。

一、入戲記者的角色自覺與意志

在實務場域，與消息來源配合的好處經常是難以抵擋的誘惑，也因此，在過去，即便共舞也未能完美演繹新聞專業。不過如前所述，在不完美中，帶舞問題終究凸顯著一種傳統記者的角色自覺，以及與消息來源抗衡、維持自主性的企圖與意志。然而當下記者的入戲卻嚴峻地挑戰了這種企圖與意志，我們發現，記者在舞台上向公關人員要求服務的作為的確展現了某種發號司令式的權力，也看似佔了便宜，但公關人員於同時間透過服務細緻調控新聞產製方向的作為，卻也讓入戲的記者默默讓渡出對於新聞事件的詮釋權力。就實務運作而言，這種讓渡是務實的、有好處的，得以順暢完成長官要求，完成每日工作。但對新聞專業來說，這種讓渡或交易卻是極為關鍵的，因為新聞事件詮釋權正是消息來源企圖主導舞台展演的原因，然而在消息來源終得所願，記者看似佔便宜的狀況下，舞台展演這種新聞產製樣態終究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入戲的記者剩下多少願意為新聞專業與消息來源周旋、施展策略的意圖？或者這些意圖是否愈加停留在只為快速完成眼下工作的戰術層次？相對地，公關人員在舞台上雖然看似失去主導性，卻為自己與長官實質贏得新聞詮釋權這個戰略層次的成功？

在這種狀況下，本研究清楚明瞭如果將舞台展演理解為一種實務場域

的演化結果，那麼有關記者角色退敗的批評總是帶有新聞專業的道德成分，但無論如何，回應 Davis (2009) 的犀利觀察，當英國國會議員與國會記者互動關係愈加建制化，國會議員愈加懂得如何利用記者，例如與記者聊天這個動作，便可能隱藏著想利用記者達成影響政策議題、釋放消息給其他人的目的。我們主張，在消息來源端用舞台上的發號司令權力換取實質的新聞詮釋權力，用戰術層次的妥協換取戰略層面獲勝的同時，當下正是重新思考記者角色與意志的時間點，否則入戲更久的記者將對現狀愈加習以為常，離工作自主、對抗權勢的傳統性格也將愈來愈遠。當然不可否認地，順著演化，記者朝全新物種前進，也許也是種社會的集體選擇。

二、設計好的透明度

近年來，在監督政府，反對黑箱的整體社會氛圍下，台灣媒體針對各種爭議事件進行強悍的質疑、批評，相對地，政府機構與企業展現即時回應，公開相關資訊的作為，像是共同傳遞一種樂觀期待：台灣開始具有民主社會所需的透明度。只是本文論述的「舞台展演」與公關的設計本質像是反諷著這種樂觀，我們不該忽略公關與消息來源展演的企圖，當下呈現的是一種設計好的透明度。

事實上，不少研究便觀察到類似情形。例如 Schohaus 等人 (2017) 發現政治人物在談話節目中的自然表現、看似原真的形象與行為，背後充滿公關人員與節目製作人間的事前協調安排。Bakker 等人 (2013) 則描述了一種事先協商好的新聞訪問行為，消息來源可以事先協商有利於自己的訪談條件，例如什麼可以公開討論，什麼不要問。對公關來說，這種事前協商，或本文所謂的公關「設計」本質，有助他們對於議題的控管。或者如同 Broersma 與 Graham (2012, 2013) 描述，記者就是引用政治人物推文、沒有查證的工作方式，造成雙方權力轉移，而看似自發與自然的推文則經常是帶有特定目的的故意行為，對應政治人物愈來愈純熟操作推特的公關技術。

當台灣公關建制化愈加成熟，公關這種設計本質也愈加影響台灣新聞產製樣貌。我們主張，就特定新聞事件來說，公關人員的確無法要求記者

不去報導、難以改變報導立場與用詞，也很難阻止某些套話式、甚至粗魯的提問。加上面對強悍的媒體，公關人員會配合媒體要求請官員出面面對鏡頭、在記者會中鞠躬道歉，這些現象與作為的確讓媒體得以宣稱自己展現了監督權勢的透明度。但如果我們換從「沒有」的角度進行觀察，公關人員沒有給記者的資料、沒有在記者會上說出的細節、沒有被安排出面的官員，這些「沒有」作為卻也陳述了一個關鍵事實：消息來源端是在進行選擇性事實陳述，以致媒體展現的是一種設計好的透明度。再配合上受訪公關可以透過綿密人脈讓媒體願意壓下某些新聞；懂得與特定立場一致的記者、名嘴保持共生關係，必要時打電話聊聊天，再透過他們說出自己不方便說的話，這些例子更意味媒體呈現的透明度是表演一部分，旨在滿足社會對於透明度的需求。

當然，這裡並不在責備公關人員不誠實，只是當公關人員基於職責決定哪些資料不可以給、哪些話不可以說，或者如同一位受訪公關所述，資料要給記者，關鍵在於你要怎麼去講，那麼，同樣基於職責的理由，記者似乎也應該試圖找出公關人員沒給的資料，找到公關安排以外的消息來源、用經過深思熟慮而非公關提供的角度詮釋新聞事件。特別在現今媒體被認為愈來愈公關化（Macnamara, 2016）的現實情境下，台灣媒體與記者一邊看似強悍、咄咄逼人，強調自己正在代替社會追真相討公道，另一邊卻又習慣接受公關人員的慷慨，缺乏脫離舞台尋找更多資料的能力與企圖，久而久之，就愈是掉入公關人員設定的框架之中。然後，滿足於「設計好的透明度」的媒體，並沒有提供真正的透明度，而是被人操控；滿足於媒體提供這種透明度的社會，終究沒有取得真正的民主，而是處在自己與媒體共同建構的正義世界中。

參考文獻

- 卜正珉（2003）。《公共關係：政府公共議題決策管理》。台北：揚智文化。
- 林照真（2005）。〈「置入性行銷」：新聞與廣告倫理的雙重崩壞〉，《中華傳播學刊》，8：27-40。
- 林慧瑛（1987）。《政府與新聞界溝通關係之研究：現階段政府機關發言人制度及其實務探討》。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碩士論文。
- 高政義（2008）。《衛星新聞台駐地記者勞動過程研究：控制與回應》。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唐德蓉（2012）。《電視新聞記者集體合作行為對職能與專業態度之影響》。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張文強（2015）。《新聞工作的實用邏輯》。台北：五南。
- 張紋誠（2003）。《政府公共關係研究：經合會與農復會之個案分析》。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碩士論文。
- 張騷遠（2012）。《電視新聞記者獨家新聞之資訊分享研究》。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陳炳宏（2005）。〈探討廣告商介入電視新聞產製之新聞廣告化現象：兼論置入性行銷與新聞專業自主〉，《中華傳播學刊》，8：209-246。
- 游淑惠（2015）。《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政府公關對記者日常互動與危機運作之探討》。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彥翔（2008）。〈搞關係、玩面子：記者面對消息來源的衝突化解策略〉，《傳播與社會期刊》，5：129-153。
- 喻靖媛、臧國仁（1995）。〈記者及消息來源互動關係與新聞處理方式之關連〉，臧國仁（編），《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頁 203-205。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 華婉伶、臧國仁（2011）。〈液態新聞：新一代記者與當前媒介境況：Zygmunt Bauman「液態現代性」概念為理論基礎〉，《傳播研究與實踐》，1：205-238。

- 詹慶齡 (2011)。《壓力下的新聞室：權勢消息來源的互動與影響》。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臧國仁 (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體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
- 劉蕙苓 (1989)。《報紙消息來源人物之背景與被處理方式之分析》。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蕙苓 (2013)。〈為公共？為方便？網路影音對電視新聞的影響〉，《中華傳播學刊》，24：165-206。
- 羅文輝、劉蕙苓 (2006)。〈置入性行銷對新聞記者的影響〉，《新聞學研究》，89：81-125。
- 羅玉潔、張錦華 (2006)。〈人脈與新聞採集：從社會資本與組織衝突觀點檢視記者如何建立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中華傳播學刊》，10：195-231。
- Bakker, P., Broertjes, P., van Liempt, A., Prinzing, M., & Smit, G. (2013). "This is not what we agree": Negotiating interview conditions i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Journalism Practice*, 7(4), 396-412.
-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 Berkowitz, D. (1991). Assessing forces in the selection of local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5, 245-251.
- Berkowitz, D., & Adams, D. B. (1990). Information subsidy and agenda building in local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67, 723-731.
- Blumler, J. G., & Gurevitch, M. (1981). Politicians and the press: An essay on role relationship. In D. D. Nimmo, & K. R. Sanders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p. 467-493). Beverly Hills, CA: Sage.
- Brants, K., de Vreese, C., Möller, J., & van Praag, P. (2010). The real spiral of cynicism? Symbiosis and mistrust between politicians and journalist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5(1), 25-40.
- Broersma, M., & Graham, T. (2012). Social media as beat: Tweets as a news source during the 2010 British and Dutch elections. *Journalism Practice*,

6(3), 403-419.

- Broersma, M., & Graham, T. (2013). Tweets as a news source: Dutch and British newspapers used tweets in their news coverage, 2007-2011. *Journalism Practice*, 7(4), 446-464.
- Broersma, M., den Herder, B., & Schohaus, B. (2013). A question of power: The changing dynamics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sources. *Journalism Practice*, 7(4), 388-395.
- Brown, J. D., Bybee, C. R., Wearden, S. T., & Straughan, D. M. (1987). Invisible power: Newspaper news sources and the limits of diversit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4(1), 45-54.
- Cottle, A. (2003). News, 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 Mapping the field. In S. Cottle (Ed.), *News, 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 (pp. 3-24). London: Sage.
- Cutlip, S. M., Allen, C., & Broom, G. (2005). *Effective public relations (9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Davis, A. (2000). Public relations, news production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source access in the British national me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1), 39-59.
- Davis, A. (2003). Public relations and news sources. In S. Cottle (Ed.), *News, 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 (pp. 27-42). London: Sage.
- Davis, A. (2009). Journalist- source relations, mediated reflexivity and the politics of politics. *Journalism Studie*, 10(2), 204-219.
- Davis, A. (2013). *Promotional cultures: The rise and spread of advertising, public relations, marketing and branding*. Cambridge: Polity.
- DeLorme, D., & Fedler, F. (2003). Journalists' hostility toward public relations: An historical analysi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9, 99-124.
- Ekman, M., & Wildholm, A. (2015). Politicians as media producers: Current trajectorie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politicians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Journalism Practice*, 9(1), 78-91.
- Ewen, S. (1996). *PR! A social history of spin*.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Franklin, B. (1994). *Packaging politic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Britain's media democracy*. London: Arnold.
- Franklin, B. (2003). 'A good day to bury bad news': Journalists, sources and the packaging politics. In S. Cottle (Ed.), *News, 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 (pp. 45-63). London: Sage.
- Gandy, O. H. (1982). *Beyond agenda 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J: Ablex.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iber, W. & Johnson, W. (1961). The city hall "beat": A study of reporter and source rol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8(3),289-297 .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Basingstoke, Hampshire [England]: Macmillan.
- Hess, S. (1981). *The Washington reporters*. Washington, D.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 Herman, E.,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on.
- Jaakkola, M., Hellman, H., Koljonen, K., & Väliverronen, J. (2015). Liquid modern journalism with a difference: The changing professional ethos of cultural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9(6),811-828.
- Kantola, A. (2012). From gardeners to revolutionaries: The rise of the liquid ethos in political journalism. *Journalism*, 14(5),606-626.

- Larsson, L. (2002). Journalists and Politicians: A relationship requiring manoeuvring space. *Journalism Studies*, 3(1), 21-33.
- Lee, M. (2000). Reporters and bureaucrats: Public relations counter-strategies by public administrators in an era of media disinterest in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Reviews*, 25(4), 451-463.
- Lewis, J., Williams, A. & Franklin, B. (2008). A compromised fourth estate? UK news journalism, public relations and news sources. *Journalism Studies*, 9(1), 1-20.
- Macnamara, J. (2016). The continuing convergence of journalism and PR : New insights for ethical practice from a three-country study of senior practitioner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3(1), 118-141.
- Manning, P. (2012). Financial journalism, news sources and the banking crisis. *Journalism*, 14(2), 173-189.
- Niskala, N., & Hurme, P. (2014). The other stance: Conflicting professional self-imag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other profession among Finnish PR professionals and journalists. *Nordicom Review*, 35(2), 105-121.
- Reich, Z (2006). The process models of news initiative: Sources lead first, reporters thereafter. *Journalism Studies*, 7(4), 497-514.
- Ryan, M., & Martinson, D. (1988). Journalists and public relations practitioners: Why the antagonism? *Journalism Quarterly*, 65(1), 131-140.
- Schohaus, B., Broersma, M., & Wijfjes, H. (2017). Negotiation games: Play metaphors in the journalist-sourc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PR and talk shows. *Journalism*, 11(8), 925-941.
- Schönhagen, P., & Meißner, M. (2016). The co-evolution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journalism: A first contribution to tis systematic review. *Public Relation Reviews*, 42, 748-758.
-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1). *Mediating the message*. New York: Longman.

- Sigal, L. V. (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Lexington, Mass.:D. C. Heath and Company.
- Sissons, H. (2012). Journalism and public relations: A tale of two discourses.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6, 273-294.
- Strömbäck, J. (2011). Mediatization and perceptions of the media's political influence. *Journalism*,12(4),423-439.
- Strömbäck, J. & Nord, L. W. (2006). Do politicians lead the tango?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wedish journalists and their political 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election campaign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1(2), 147–164.
- Strentz, H. (1989). *News reporters and news sources*.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Turk, V. J. (1986). Public relations' influence on the news.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7(4), 25–26.
- Verčič, A., T. & Colič, V. (2016). Journalists and public relations specialists: A coorientational analysis. *Public Relation Review*,42, 522-529.
- Verweij, P. (2012). Twitter links between politicians and journalists. *Journalism Practice*, 6(5-6),680-691.
- Voakes, P. S., Kapfer, J., Kurpius, D., & Chern, D, S. (1996). Diversity in the news: A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3),582-593.
- Vobič, I., Maksuti, A., & Deželan, T. (2017). Who leads the Twitter tango? Studying the journalist-politician relationship in Slovenia through Twitter conversations. *Digital Journalism*,5(9),1134-1154.
- White, J., & Hobsbawm, J. (2007). Public relations and journalism: The unquiet relationship - a view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Journalism Practice*,1(2),283-292.

Whitney, D. C., Fritzler, M., Mazzarella, S., & Lakow, L. (1989). Geographic and source bias in network TV news, 1982-1984.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3(2), 159-174.

Wolfsfeld, G. (1984). Symbiosis of press and protest: An exchange analysis. *Journalism Quarterly*, 61(3), 550-555,742.

Relationship among Journalists, Sources and PR Professionals

Wen-Chiang Chang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journalism paradigm, the journalist – source relationship is the key proposition to study news production. However, amid Taiwan’s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ublic relations has challenged this proposition.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news production should be analyzed by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ournalists, sources and publicists.

We propose the new “performance on stage” approach. On stage of news production, Publicists play an intermediate role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sources. On one hand, publicists allow the sources to stand backstage or appear onstage only in careful arrangement; the sources hence do not face the press directly. On the other hand, publicists attempt to have journalist willing to perform cooperatively onstage by providing all the services they need, in order to lower the possibility of negative reports on the sources. In practice, “performance on stage” meets the demand of the three parties and facilitates news production.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journalism paradigm, nevertheless, performance on stage” undermines the professional role of journalists and leads to a journalistic crisis by offering the “transparency by arrangement”.

keywords: journalist, reporter, news source,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